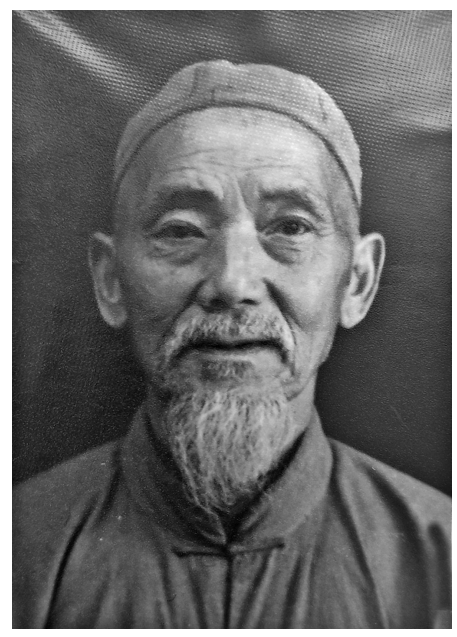
梵净信使

周静



杨秀涛先生晚年遗照。

楔子：茶山上的倔人

贵州省江口县怒溪镇。冬日的骆象茶山，墨绿色的茶垄顺着山势起伏，如凝固的波涛。海拔1000余米的山风，清冽而直接。就在这茶垄间的“插花地”里，一位老人正扶着犁，吆喝着老牛，翻开深褐色的泥土，正在翻犁满地的红苕。

他叫吴礼光，骆象村回家坝人，今年75岁。很瘦，但很精干。岁月染白了山头的云雾，却似乎饶过了他的头发，不见一丝银霜。退伍军人证明上，白纸黑字写着“汉族”，可他逢人便倔强地纠正：“我是苗族，1982年开展民族识别那会儿，没给认上。”

这个认定自己“苗族”身份的退伍老兵，生命中有一段被时光尘封的传奇。这传奇，与另一个人紧密相连——留法画家、教育家杨秀涛。而传奇的开端，藏在一封几乎不可能寄出的信里，埋在梵净山麓这个叫“回家坝”的高山村落之中。

高山来客：留法画家与他的“流放地”

时间倒回至1966年10月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风暴，从城市卷向乡村。

在省城贵阳，因“历史问题”早已离开讲台的杨秀涛，被扣上“国民党国大代表”、“地主分子”的帽子，连同家人被遣送到当时的江口县桃映区地楼公社骆象大队“接受改造”。他被遣送到一个地图上难以寻觅的小村落——回家坝。

最初的落脚点，是村民吴黑狗家闲置的偏屋。当时，吴黑狗已经去世有年，房屋被闲置着。对回家坝的村民而言，这位年逾古稀、戴着眼镜、说话温文尔雅的老者，是个十足的“怪人”。他干不了重活，队里安排他和妇女、老弱一起，从事薅草、匀油菜苗等轻松省力的活计，工分也和妇女一样，只有7分，而全劳力最高有15分。口粮按“人7劳3”分配，他这个“地主分子”和妻子每人每月有25斤遣放补助，掺着红薯、玉米，日子清苦至极，而就是这种补贴，也仅仅只补最初的3个月，之后的日子，全靠工分苦熬。

村民们并不知道，眼前这个需要他们偶尔帮衬着捆柴禾、步履蹒跚的老人，有着怎样波澜壮阔的过去。

杨秀涛，生于1896年，江口县双江街道人。他是贵州最早睁开双眼看世界的人之一。1923年，他远渡重洋，考入法国巴黎美术学院攻读油画专业，是贵州最早的留洋美术学子之一。杨秀涛获得油画专业硕士学位，先后游历了德国、瑞士、意大利、英国等11个国家，受比利时国王之邀其为财政部客厅创作绘画。算得上为外国显赫场所作画的少数中国人之一。在巴黎，他不仅与画家潘玉良、日后成为国民党高官的张道藩交游，更与一位年轻的共产主义者——周恩来——结下深厚友谊。周末的聚会，这群热血青年辩论国是，畅想未来，艺术理想与救国思潮激烈碰撞。归国前夕，周恩来特意嘱咐杨秀涛经苏联归国。周恩来的理念，深深影响了杨秀涛，周恩来的关心，也深深地感动着杨秀涛。

1928年，杨秀涛学成归国，拒绝从政诱惑，投身教育。他先后任教于上海新华艺专，并于1942年在家乡倾尽其在上海、南京等地举办画展所得的一万多银圆，创办了江口中学，出任首任校长，开一方文教之先河。1948年，他以“国大代表”身份赴南京参会，面对已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老友张道藩的再次劝诱，以及贵州省主席杨森给予的县长职位，他仍选择赴贵阳担任省艺术馆馆长，创办“艺术训练班”，将现代美术教育火种引入贵州校园，被誉为“贵州美术教育鼻祖”。

然而，历史的风向急转直下。1949年，他坚定地拒绝了张道藩一同赴台的邀约，选择留在大陆。但“国大代表”的身份，成为时代烙在他身上洗脱不去的印记。从大学讲坛到民族学院，他最终在政治运动中一路沉沦，被“劝退”，被批斗，直至1966年，以七十高龄，被遣送至这黔东北高山之上。

在回家坝，杨秀涛是“地主分子”，是批斗对象。然而，这个“学究派”老人，凭其温和的言谈、与世无争的性情，竟很快赢得了质朴山民的同情与尊重。1967至1968年间那场形式大于内容的批斗会上，当口号声响起不过十几分钟，台下便有人——正是年轻气盛的吴礼光——一个箭步冲上前，吹熄煤油灯，将它扔进稻田。斗争，在黑暗与寂静中尴尬收场。

高山相守：一栋木屋与一次深夜寻人

彼时的吴礼光，在家中排行第三，故人称“老三”，其家境赤贫，常常饭都吃不饱。他看不得这无谓的折辱。杨秀涛也记住了这个仗义的后生。常年寄人篱下也不是个长久办法，杨秀涛渴望有个属于自己的陋室。后来，远在贵阳的长子杨智天倾其所有积蓄也只有180多元，又向同事借了10多块，凑齐200元汇给父亲杨秀涛，杨秀涛遂决定在回家坝置一间属于自己的居所，花了这长子省吃俭用筹集来的200元，购买了一栋破旧的青瓦木屋，建在离吴礼光家不足百米远的地方。1968年5月，政策似乎出现一些松动，次子杨智全恢复工作，得以回到县城商业局上班，杨秀涛一家回归县城露现曙光，村里不少人盯着杨秀涛刚刚建成的房屋这便宜，杨秀涛却对吴礼光说：“老三，这屋子我想留给你。你先下5块钱定金，堵别人的嘴。”吴礼光拿不出5块钱，杨秀涛摆摆手：“下了，意思到了就行。”最终，这木屋以原价“卖”给了吴礼光，钱，自然也一直欠着。这是一位落难长者，对一位赤诚青年最含蓄的报答与托付。

更深的羁绊，发生在1967年一个炎热的夏夜。年逾七旬的杨秀涛清早上山砍柴，半山以下，早已被村民砍得光秃秃的，要砍把像样的柴禾，得向更高的山顶上爬。杨秀涛人老力衰，捆好的柴禾怎么也扛不动，忙到天黑仍困在山顶。老伴肖氏焦急地找到吴礼光：“老三，你杨伯还没回家嘞！”

吴礼光二话没说，叫上弟弟吴志光，抓起手电便钻进漆黑的山坡。在手电筒微弱的光束中，他们发现老人正仰躺在山顶，望着星空，准备就此露宿一夜。八九月的山顶，夜风疾吹，寒意浸骨。吴礼光兄弟一个打灯扛柴禾，一个俯身，将瘦削的老人稳稳背起，一步步挪下陡峭的山路，送回家中。

背上的温度，山风的寒冷，那一刻，两颗心跨越了年龄、身份与学识的鸿沟，紧紧贴在了一起。杨秀涛知道，在这高天远地，这个叫吴礼光的苗族青年，是他风雨飘摇晚年里，一根坚实的拐杖，一簇温暖的火。

高山之托：那封写给总理的信用生命不负所托

杨秀涛在回家坝一待就是6年，期间，妻子肖氏在期盼中去世，永远留在了这座高山之上。然而，杨秀涛本人的问题依然久悬未决，仍然困守高山。他心中有一团火，有满腹的委屈、一生的抱负想向一个人倾诉——那个在巴黎结识的、他深信能够理解他的友人，如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，周恩来。

多年来，他数次提笔给国务院、给周总理写信，但信件无一例外被邮局扣下，从未送出过铜仁地区。希望，在一次次石沉大海中渺茫。

转机出现在1972年12月。19岁的吴礼光体检合格，即将入伍赴京。消息传来，杨秀涛枯寂的眼中骤然迸发出光亮。他颤巍巍地找到吴礼光，拉着他的手，老泪纵横：“老三，你要去北京了……我，我想托你带一封信。带给周总理。只有你能帮我了！”

这是一次冒险。由现役军人私自携带、转交信件，尤其是“历史有问题”的人写给国家领导人的信，风险巨大。但吴礼光看着老人眼中近乎绝望的期盼，想起了那个背他下山的夜晚，想起了批斗会上那盏被他扔掉的煤油灯。这个倔强的苗族汉子，点了点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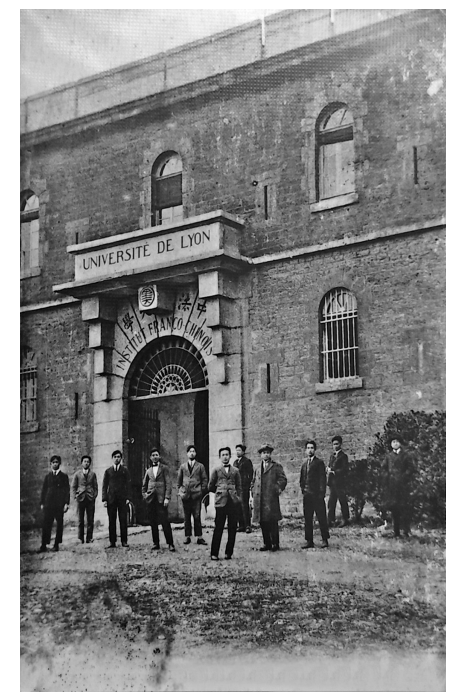
接兵干部严主委已住进吴家。12月18日夜，杨秀涛在昏暗的油灯下，用毛笔一字一泪，写了又撕，撕了又写。国家的前途、个人的沉浮、教育的理想、晚景的凄凉……千言万语，如何在一纸信笺上承载？如何能通过最朴素的语言，穿越层层屏障，抵达那位日理万机的故人手中？那一夜，回家坝的木窗上，映着一个佝偻而执着的剪影，直到东方既白。

19日清晨，出发在即。杨秀涛将最终写就、封好的信，仔细地、郑重地塞进吴礼光冬装棉衣最里层的荷包，用别针扣牢，按了又按，仿佛按着自己毕生的寄托与性命。

使命必达：新兵棉衣里的“绝密任务”

从玉屏火车站挤上运兵的闷罐车，历经数日颠簸，吴礼光于1972年12月26日抵达北京，成为铁道兵某部的一名新兵，驻扎在石景山新兵营。那封紧贴胸膛的信，像一团火，时刻灼烫着他。

1973年元旦，放假。一位好心的老兵带着吴礼光等几个新兵进城。车到天安门附近，吴礼光按照杨秀涛事前的再三叮嘱和老兵的提醒，辨认着方向。他假意闲逛，悄然脱离队伍，眼盯着前方，紧张得手心冒汗。终于，他找到了那个庄严肃穆的大门——中南海邮局。他迅速从内衣口袋掏出那封已被体温焐得发软的信，塞进绿色的邮筒。整个过程，他不敢左顾右盼，心跳如擂鼓。投出信的刹那，他感到肩头一轻，仿佛完成了一场无声的战斗。



杨秀涛在欧洲游学。

信，终于送出去了。但结果如何？他不知道。他只能在军营中等待，在训练的忙碌中等待，在施工的汗水里等待。他参与了部队营建，去过唐山大地震的救灾现场，也曾在1976年9月后，投入到一项神圣的工程——修建毛主席纪念堂。他挥汗如雨，觉得每一锹土，都像是在为那封信增添一份重量。

1973年5月，一个平常的日子，部队领导突然找到吴礼光，神情严肃又略带缓和：“吴礼光同志，你从家乡带来的那封信，组织上已经收到了。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。”没有更多的话，但吴礼光懂了。他立正，敬礼，眼眶发热。杨老的信，终于被那个其实早已深陷病魔的“他”看到了。

回声与余韵：五百元汇款与一座城的震动

1977年，吴礼光退伍返乡。他第一时间去探望已回到江口县城的杨秀涛。老人紧紧抓着他的手，未语泪先流：“老三，总理收到信了！他给我回信了，还给我汇了500块钱来！”

500元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是一笔巨款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钱和这封信背后代表的意义。周总理的亲笔信和汇款，在小小的江口县城引发了巨大轰动。它像一个权威的“证明”，洗刷了长久以来笼罩在杨秀涛身上的部分阴霾。因为这封信，当地政府迅速落实政策，杨秀涛的待遇得到改善，彻底结束了遣送生活，得以在县城安度最后的晚年。

杨秀涛没有忘记吴礼光。即使不能报答在吴礼光身上，也要报答到他的家人身上。他动用人情，为已到成家年纪的吴礼光二哥吴利光做媒，娶了贤惠的妻子。那间回家坝的木屋，他正式交付给了吴礼光，了无牵挂。

1979年，杨秀涛病逝，享年83岁。这位一生漂泊，将艺术献给欧洲宫廷，将教育与理想献给祖国和故乡，最终将风骨与感激献给高山的老人，走完了他复杂而传奇的一生。他的画作散佚四方，他创办的江口中学书声琅琅，而他与一位高山农民之间超越阶层的生死之托，成了梵净山麓口耳相传的隐秘故事。

尾声：信使的今生与永恒的守护

如今，在骆象村的茶山上，吴礼光依旧劳作。他养猪，种地，守着那栋早已翻新但地基依旧的老屋。岁月将他从冲动的青年磨成了沉静的老者，但眉宇间的倔强未曾稍改。他很少主动向人讲述那段往事，仿佛那只是人生中一件本应去做的平常事。只有当历史学者或好奇的访客问起，他才会用夹杂着方言的普通话，平静地回溯那段惊心动魄的旅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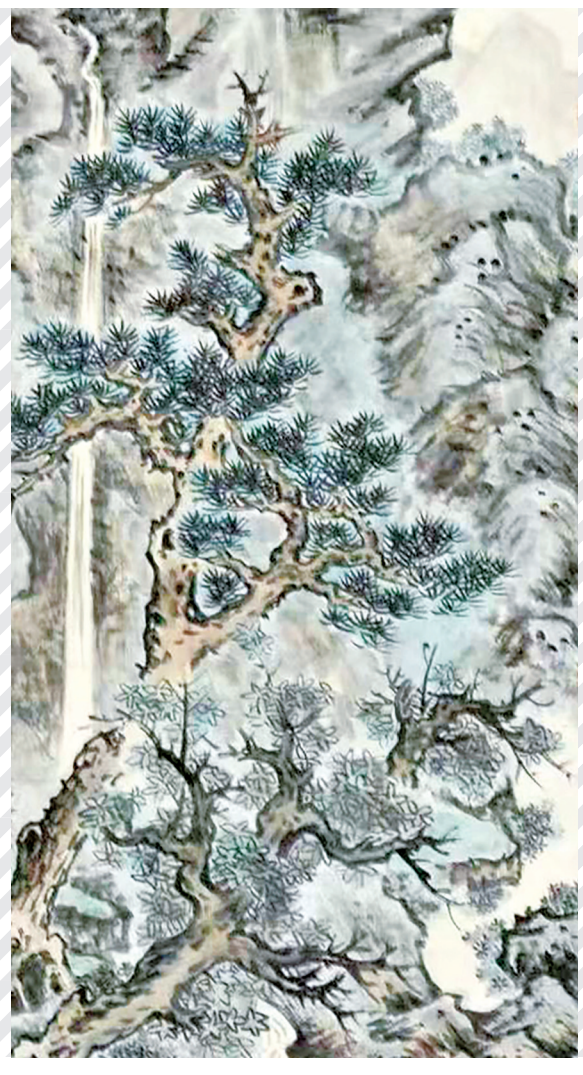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就是带个信。”他总这么说，说得轻描淡写。

他守护了一位老人最后的尊严与希望；而那位老人，用一封信，连接了高山与庙堂，最终也“守护”了他自己历史的清白与温度。那封信的具体内容已成谜，但信中所承载的信任、勇气、忠义与超越时代的温情，却如梵净山的云雾，滋养着这片土地。吴礼光守护的，不仅仅是一个落难的知识分子，更是一段不应被湮没的历史，一种“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”关系最本真、最动人的可能——那是在极端年代里，人性良知对荒谬的抵抗，是朴素的善对孤独灵魂的救赎。

吴礼光依旧坚称自己是苗族。

或许，在他心中，那种如大山般沉默、坚韧、重信守诺的品格，便是他认定的、流淌在血液里的民族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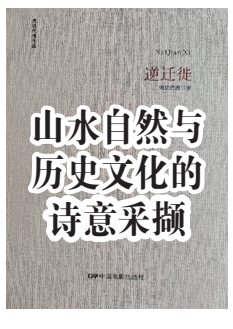
而杨秀涛的故事，也因这“高山信使”的存在，从一个个体的沉浮史诗，落地为一则关于守护、信任与回报的，有温度的中国故事。



杨秀涛先生 作

本期导读

B2版深度阅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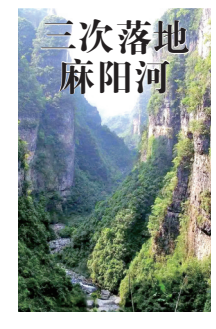
思辨共形质媲美
理性与才情齐飞

B3版文苑翡翠

就是为你而写
读懂了，

木匠二舅
盘石高地

B4版文艺长廊



七星源

住房公积金　圆您住房梦
服务热线：0856-12329
查询网址：gjjzx.trs.gov.cn
铜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我爱我家
和谐城管
服务热线电话：0856-8162019
铜仁市城市管理（城市综合执法）局